

恩游集

方修著

息游集

方修著

春艺图书贸易公司出版

新加坡

目 次

《新马文学史论集》前记·····	1
〔附录〕新马华文文学发展	
轨迹的探讨（蔡师仁）·····	6
《马华新文学简史》新版序·····	18
《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再版序·····	23
《马华文学作品选》出版前言·····	28
《方修自选集》校后记·····	32
关于林连玉·····	39
一封短简·····	41
《奔流·童年小辑》妄评·····	43
谈杂文	
——连奇著《小楼随笔》代序·····	46
读甄供的《蒜苔赋》·····	55
形象、思想问题札记·····	63

〔附录一〕再谈形象大于思想(秦阳)·····	70
〔附录二〕致《热带文艺》编者信(蔡师仁)·····	74
〔附录三〕从形象大于思想 到读者大于作家(一零)·····	76
胡一声否认宿女为其笔名·····	81
〔附录〕读方修《胡一声否认 宿女为其笔名》后(马仑)·····	84
郭沫若佚文《刘岩墓志》·····	87
一副挽联·····	91
冯伊湄佚作《满江红》·····	96
《佐丁诗稿》后记·····	101
长河著《掠过夜空的彗星》序·····	104
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概观·····	113
绪言：六十年来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一瞥·····	113
一、《新生活》和《商余杂志》时期·····	121
二、《洪荒》——《压觉》时期·····	134
三、《狮声》前期·····	146
四、《狮声》后期·····	158
后记·····	172

《新马文学史论集》前记

这是我的一册谈论新马华文文学的散稿的选集。基本上是按照出版社的建议来编的。出版社提出的编法是：内容以史料性和评论性的稿件为主，如每年有关文艺界动态的报导等；目的是希望对于外地人士的了解新马华文文学有点帮助；字数在二十五万至四十万之间，最好是谈论战前的部份占三分之一，战后占三分之二。因为战后这一段，目前还找不到现成的文学史著作，所以在编选上不妨着重些。

书编了出来，对于上述建议，看看勉强还能符合。只是我自己觉得和着手编书时的预期还有些距离。

本来，我准备以三十五万字左右为限，选入资料性和评论性的文章各一半；资料性部份，也包括五十年代以后一些关于一年间文艺活动的报导。心想，这样编法，应该不至于碰到什么难题吧。但事实上却没有这么顺手。单单那些一年一篇的流水账式的报导文字，凑集起来竟然超过了二十万字，占了书稿的一半以上的分量，这是我原先没有料到的。而这些报导文字，在形式上又约略等于文艺活动纪年，虽然写得

粗拙芜杂，各篇之间仍然有其连续性，不选便吧，既然要选，那就只好照单全收、鱼沙俱下，避免某些年份的缺漏，造成读者检视史料时的不便。然而这么一来，书中的资料性文章必然大大超出了预算，容纳评论性文章的篇幅则须相对削减，两者比重于是失去平衡，和较早时编书的打算不一样了。唯一可以解嘲的是，许多资料性的文章中，也经常带有评论的成份，或者可以当作部份评论文字来看吧。

现在全书分成三辑，另加一组附编。

第一辑是若干篇对于战前以及战后初期的马华文学历史的论述。其中有的是一两册文学史编著的绪言，有的是外国刊物的约稿，也有的是演讲词，演讲词的纪录又有的比较详细，有的十分简略；所以文体上是颇为参差的。但凑合起来却也可以约略见出战前以至战后初期的马华文学的一个发展轮廓，包括文艺思潮、作者作品、戏剧活动等情况。

第二辑即上面提到的一年间的文艺活动报导；起于一九五六年，迄于一九七八年，前后历二十三年，大都发表于《星洲日报》新年特刊。其中有两年各多出一篇，那是应约写给其他报刊的；记得一篇是香港的《南洋文艺》，另一篇是吉隆坡的《文艺春秋》。但在这二十余年间，我也有过两年未曾写这类稿件。原因是当时我正忙着替世界书局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腾不出时间来动笔；只在后来自己出版的一册小书里面附入一份新书编目和戏剧演出剧目，稍微弥补这个空白。

我没有动笔的那两年——一九七〇和一九七一年，正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新马文艺活动较为热闹的两个年辰。这期间，本地新创办的定期杂志和文艺集刊，多至十余种；如一九七〇年有《青年文艺》月刊、《奔流》月刊、《创作与文摘》月刊、新大中文学会的《激风》季刊、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的《新时代》双月刊；一九七一年有《人民生活》月刊、《赤道诗刊》（双月刊）、《知识分子》双月刊、《大地》月刊、《笔端》双月刊、《蓝白领》月刊、《自由列车》集刊，以及吉隆坡的《风雷文丛》（第一册集刊为《下乡》）等。这些出版物，十之八九都是富有朝气而又很有水平的。报章副刊方面，这两年间也有一番比较新的面貌。如《星洲日报·青年园地》的革新（一九七〇）、《文化》周刊的创刊（一九七一）、《南洋商报·新年代》（一九七〇）和《艺术》（一九七一）的增设等，都是这一个小阶段内的事。其他如杂文、诗歌、短篇小说、文艺批评等作品的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亦均颇为显著。可惜我偏偏没有机会参与其盛，尽一点报导评介之责，想来不免感到遗憾。

但我补列出来的那一单新书编目，也还不无一丁点用处。不久前在吉隆坡的一个刊物上读到一篇整理新马书刊出版史料的文章，觉得其中有关七十年代初期文艺新书出版的一节，似乎就曾参考过这份编目的。

一年一度写这类文艺活动的报导文字，在我来说是半职业性质的；即是说，那是报馆的新年刊的编辑指定的题目，不得不尽可能挤出来交卷，写的时候也比较平时在副刊杂志

上自由投稿多了一层拘束。另一方面，为了要和新年刊上面其他一些总结性的文章格调接近，我也尽量采用报章记者的新闻报导的写法，并且侧重事象的纪载，减少主观的论断。于是我用了一个新的笔名，表示这些文字和我在其他版位写的稿件，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性质。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来编这么一册文集，把两类不同性质的文章合在一起，不同的笔名也统一了。但是，尽管如此，敏锐的读者，都还可以看出，这一辑的大部份文字的调子，和另外的两辑其实是不大一致的。

因为是半职业性的文字，当年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没有多大的兴趣。后来，我渐渐投入对于战前和战后初期的文艺史料的搜集发掘。接着，又在一间学校的中文系兼了点课，时间愈来愈紧。加上由于某些原因，话是愈说愈少，于是对于每年年终来整理这么一篇流水账，就愈来愈觉意兴阑珊。最后几乎视为一项苦差，在勉强应付了。所以这二十余篇稿子，一般说来是愈写愈短的。这一点许多人早就发觉到了，友人W君还骂过我：“你简直在浪费材料嘛！”近几年来，我不吃报馆饭了，偶有新年刊的编辑来出这类题目也不必搜索枯肠去应付了；逍遥自在，无过于此。

这么说来，这些流水账式的东西，内容尽皆平淡不过，是完全可以想像到的。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然而，不知怎的，它们竟也会招致一些人的嫉忌怨忿。那些年头，明枪暗箭，不时袭来，防不胜防。有无理取闹的，有凶声恶气的；有所谓朋友的背后一刀，也有卑鄙小人的暗藏杀机；真是形

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积年累月，量上倒也有些可观。如果汇集起来，是足够编成一册《围剿集》的。可是我自身早已伤痕累累，那有闲工夫去搞这些捞什子呢！所以除了其中的一小部份，我在年终岁暮写报导文字时曾因利乘便略予答覆之外，其余的大部份，就都让它们随着时间湮没了。但因为缺少一册《围剿集》来录此存照，若干读者现在反而会觉得这里有些地方好像是在无的放矢似的，也说不定。

接下来是本书的第三辑。这一辑的文章似乎比较杂了一点。大抵凡属不是纯粹谈论本地文学历史的演变，又不是报导一年间文艺界的动态者，就都归到这一辑来。由于不是着重资料的记述，评论性可能会稍为强些。本来还收入了好几篇替别人的书所写的序跋，当作是对于战后若干文艺出版物的评介。但因篇幅关系，都临时抽去了。所以这一辑的分量，看来要比第一二辑还薄弱些。

附编所收的三篇访谈录，我想可以作为以上三辑正文的一点补充。譬如，在李向先生的《战前的马华文艺》中，我谈到战前中国文艺与马华文艺的微妙关系：“它有这么一个规律，每逢中国发生大事件、大动荡、民族危机特别严重的时候，中国文艺和马华文艺的关系就很密切。碰到没有大事件发生时，这个关系就松缓。它不是一个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也不是从头到尾一个状态，而是一松一紧、一紧一松。……”这个看法与向来一般人所理解者不同，而在我的其他作品中都还没有提及。又如，爱薇女士与甄供先生的两篇，谈到

有关整理本地文学史料诸问题，对于有些想了解这一方面的现象的读者，或者也会有点参考意义的。

末了，交代一下书名问题。起初我是定为《三十年集》，因为我的论述一点文学史问题或整理一点史料之类，是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迄今算来是将近三十年了。但几位熟人都认为这个书名不够明确，未能反映出本书的内容，应该换一个。恰好有人提出“史论集”字样，我贪图方便，拿来套上几个字，结果就凑成了《新马文学史论集》。这自然也是不大能够满意的，它显得有些名过其实，唸起来也略嫌囉苏，但我此刻实在是空疏到想不出一个较适切的名称来了。

一九八四年五月廿二日·新加坡

〔附录〕

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轨迹的探寻

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 蔡师仁

一

新马华文文学（即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为新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新马地区的马来文学、淡米尔文学、英文文学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多年来，人们由于资料匮乏和其他社会历史原因，对它的研究十分不够。对于我国许多文学研究工作者（包括笔者）来说，它至今仍是块处女地。随着新马地区，特别是新加坡地区经济的崛起，和当地一批孜孜不倦的华文文学史家的努力，新马华文文学

的历史面貌已逐渐刮清，并在世人面前放射出引人瞩目的光彩。日本、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学者、专家的研究目光，开始投向这个领域，我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也不例外。

在众多的新马文学史研究工作者中，新加坡的文学史论家方修先生是位无可争议的佼佼者。方先生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致力于新马华文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抱病工作。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邃、智慧的眼光，使他在新马华文文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建树不仅受到新加坡政府当局的表彰和奖励，而且得到世界各国关心新马文学人士的承认和推崇，有的学者甚至把这位最负盛名的文学史论家誉为新马文学的泰斗。

方修先生1921年出生在中国，30年代后期南渡定居新马。半个世纪来，他与同代人一样经历了风风雨雨。1942年马来亚沦陷前夕，年仅21岁的方先生便在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后来被投入黑牢。马来亚沦陷期间，他同当地文化人一样到处颠沛流离，过着逃难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方先生才从村镇辗转返回新加坡。方先生一生著述甚丰，已出版的著作达十余种，编纂的书籍也多达几十册，字数总共不下几百万。他的著述已被许多国家的学者翻译和介绍，成为各国学者了解和研究新马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新近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和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的方先生的新著《新马文学史论集》，是一部相当能够体现方

先生文学史观的论集，它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方先生对新马华文文学历史及其他文学问题的见解。可以说，这是一部研究方先生其他论著的不可不读的重要著作。这个论集共分三辑，第一辑是关于新马华文文学历史的论述。第二辑是1956年至1978年新马文学创作和活动的报导。第三辑是对若干文学问题的评论。从这个史论集里，我们可以看到方先生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轨迹的执着探寻，和为建立新马华文文学史所作出的可贵贡献。

二

在《新马文学史论集》里，方先生首先就“马华新文学”（即新马华文新文学，下简称新马华文文学）的概念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认为新马华文文学“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很显然，方先生指的新马华文文学是一种以华文作媒介的白话文学，它有别于中国“五四”运动以前，新马地区华文作家用文言文写的旧文学。当然，新马华文文学的新旧区别主要还在于二者所体现的思想和精神不同。旧文学从总体上说仍然属于封建主义文学；新文学则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出现的，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所以方先生认为新马华文文学也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新马华文文学的精髓所在。另外，方先生也十分强调新马华文文学在地域上的规定性，即它必须是在马来亚地区诞

生的。它虽不排斥用华文反映中国或其他地域的生活，但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则必须是地道新马地区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方先生的上述观点，从如下几方面来界定新马华文文学的概念：它的创作媒介是中国的白话文；它的思想和精神受到中国“五四”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它的创造主体（即作品的创造者）是新马地区的作家群；它的对象主体（即作品的描写对象）是新马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当地人的心态；它的接受主体（即作品的阅读者）是新马地区的读者群和批评群。

方先生对于新马华文文学涵义的论述，在很大的程度上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一地区华文文学涵义的混乱认识。过去许多论家对新马华文文学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有的认为这一地区的华文文学属于“南洋文化”，有的则用“侨民文学”来标示。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未能揭示这一地区华文文学的根本性质。“南洋文化”着眼于文学作品的热带乡土气息和南洋色彩，强调作品描写南洋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方言特点等等。这些东西自然是当地华文文学常有的特征，但只是一些表层的标志，它们并未能显示蕴藏在作品深层的属于思想精神方面的根本素质，更何况“南洋”在地域上还包括泰国、缅甸、印尼等等，所以无法表明新马这一独特地区华文文学的特征。“侨民文学”论者则因战前侨民身分的作家甚多，且常写些中国的生活，就误以为他们的创作意识是中国的，他们的作品也是服务于中国的。这种论断多受过去西方学者歪曲马来亚史，抹煞当地华文作家为建立新

马文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影响。事实上，当时侨民身分的华文作家甚至当他们在描写中国生活时，也未放弃用他们的笔为当地民族民主运动服务。所以说，这些曾经数度争论的概念，虽在一定程度上也触及了华文文学的某些特征，但均未能正确说明它的本质。而方先生则能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从新马华文文学同中国现代文学的横向联系，从文学的主体性等方面来阐述它的特征，从而给予科学的概括和界定，这就使得他的论断，在论争中显得特别富有说服力。

三

方修先生对于新马华文文学的界定，并非一种凭空的杜撰，他的文学史观的建立有着十分充分的文学史料的根据。他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册，几乎囊括了二次大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所有重要史料；《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四册又收入了战后的主要史料。在本史论集里，方先生则亲自撰写了1956年到1978年的新文学每年的报道。方先生正是在如此丰富的原始材料基础上，通过对新马华文文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思想艺术特色和创作方法的考察，通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平行比较后，才形成比较明确的新马文学史观的。

方先生认为，新马华文文学同中国现代文学几乎同步诞生，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这一论断无疑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世界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也是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这种影响既发生在多民族的同一国家里，也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影响则是一种更为特殊的现象。这是一个国家地区的民族文学对于别一个国家地区的相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移居新马地区的华人不管在取得所在国国籍之前或之后，都属于中华民族，所以在他们为该地区华文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努力时，不可避免地要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以超过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先生就是根据这种规律，把新马华文文学大体划分为战前、沦陷和战后三阶段。我们试就战前阶段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它同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方先生把战前阶段划分为四个时期。1919年至1925年称为“萌芽期”，这一时期的华文文学是随着中国“五四”文化运动的余波而“滥觞起来”的，它不仅采用白话文，而且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1925年至1931年称为“扩展期”；这一时期的华文文学深受中国进步文学家提出的进步文学主张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创造社、太阳社大力提倡革命文学，新马华文作家也发起了“新兴文学运动”，并把文学的描写对象逐渐移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身上，比较敏锐地触及了当时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揭露了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到了1932年至1936年，由于当局对新兴文学的压迫，加上中国文坛上“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错误文艺思潮的影响，新马华文文学受到巨大挫折，形式主义、自然主义充斥文坛，许多进步作家虽奋力抗争，仍扭转不了

整个萧瑟衰颓局面，方先生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低潮期。”1937年到新马沦陷前，称为“繁盛期”。这一时期，作家队伍壮大，文学刊物增多，作品质量提高，理论批评发达，抗战救亡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都与中国抗战时期进步文艺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新马华文文学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艺术技巧上也深受中国著名作家、诗人如鲁迅、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等的影响。方先生认为，这种影响，在当时远远超过了当地作家的相互影响。正是鉴于上述情况，方先生在史论集里，反复强调了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探讨两种文学的密切关系时，方先生还颇有见地地从文学创作方法这个角度来加以考察。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方法常常随着各国各民族社会思潮的相互影响而逐渐扩大其影响。例如狄更斯、巴尔什克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近两个世纪以来就影响了各国进步作家；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也曾影响了欧洲各国文学。中国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则随“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的社会思潮的掀起，给新马华文文学以深刻的影响。方先生在考察新马华文文学创作方法的演变时，就明确指出了中国现实主义传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体上有五种形态，即客观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彻底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新旧过渡期的现实主义及新现实主义。他据此进一步考察和比较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新马华文文学现实主义的联系和区别。他指出，新马华文文学的现实主

义只有四类，缺少中国的“彻底的批判的现实主义”这一类，而最后一类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也不太多，所以实际上只有三类。他认为这三类当中无论哪一类都深受中国现实主义的影响。如“萌芽期”富有代表性的客观现实主义作品陈桂芳的《人间地狱》，对于上流社会人物的假面具的揭露，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叶绍钧《潘先生在难中》对于当时教育界一些官僚假面具的揭露的影响。方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分类是否确切虽尚可进一步商讨，但他能从创作方法这一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种富有学术眼力的表现。因为创作方法归根结蒂是作家认识生活、表现生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作家尽管描写的对象和所采用的技法可以有千差万别，但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却最容易从他们所遵循的创作原则中体现出来。所以从创作方法的异同着眼，是很容易窥察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

四

方修先生虽然十分强调“马华新文学的诞生，是渊源于中国五四文学运动，其后的发皇滋长，也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他也注意到了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别，我们可以把这种区别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马华文文学在“萌芽期”虽有反封建的思想因素，但多属改良主义，技巧也较稚嫩。它不象中国“五四”